

泛突厥主义

文苑

新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陈延琪, 潘志平主编.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 5

ISBN 7-228-05728-7

I. 泛… II. ①陈…②潘… III. 大土耳其主义—文化—研究 IV. D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6348 号

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

陈延琪 潘志平 主编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电话: 2825887 邮政编码: 830001

印刷: 新疆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4.6875

印数: 1—3000 册

字数: 80 千字

版次: 200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8-05728-7/D·637

定价: 8.80 元

目录

引论	/ 1
第一章 泛突厥主义的由来和发展	/17
第一节 背景	/19
第二节 兴起：俄国的“鞑靼斯坦”	/23
第三节 土耳其：重新发现了“突厥”	/27
第四节 发展：一次次失败的记录	/29
第五节 所谓的“被压迫的突厥”	/32
第六节 现状和趋势	/34
第二章 泛突厥主义及其文化观的研究	/42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对“泛”思潮的批判	/42
第二节 西方学者的研究	/48

第三节	泛突厥主义分子的“泛”论	/51
第三章	泛突厥主义文化观的内容和本质	/56
第一节	民族观：语言因素和种族主义色彩	/58
第二节	宗教观：与泛伊斯兰主义并无实质区别	/61
第三节	历史观：社会唯心主义	/64
第四节	国家观：大突厥国家大到什么程度	/66
第四章	泛突厥主义文化观批判	/69
第一节	封闭而又超时空的意识形态	/70
第二节	狭隘、排他的种族沙文主义	/74
第三节	腐朽、没落的贵族“精英”文化	/78
结语		/83
附录一	恩格斯论泛斯拉夫主义	/94
附录二	斯大林论泛突厥主义	/106
附录三	苏联学者论泛突厥主义	/108
附录四	以色列学者论泛突厥主义	/127

引论

陈延琪

(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1

“文化”是一个不断向广延度和深刻度拓展的概念。中国古代的“文化”概念，大约指文治教化的总和，与天造地设的自然相对应，与无教化的“质朴”和“野蛮”形成反照。至于“文化”的西方对应词——拉丁文 cultura，其原形为动词，含有耕种、居住、练习、留心或注意、敬神等多重意义，包含着通过人的主观努力摆脱自然状态的意味。十六七世纪，英文和法文的 culture（德文对应词为 kultur，俄文对应词为 культура）逐渐由耕种引申为对树木的栽培，并进而被指为对人类心灵、知识、情操、风尚的培育。在汉语词汇中，与 culture 的内涵较为

接近的有“文化”和“文明”两词，而从人类的物质创造（尤其是对火的利用）引申到精神的光明普照大地的“文明”一词似乎更为切合 culture 的内涵。“文明”较之于“文治教化”的“文化”一词内蕴更广，而接近于今日我们所说的广义文化，即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本书研究的文化主要是狭义文化中的主体部分——社会的意识形态，即关系人类社会生活的思想理论、道德风尚、文学艺术、历史政治、哲学宗教、教育等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的内容，同时也涉及一些广义文化的问题。

“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具有以下属性：

时代性：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阶级社会中，它具有阶级性。

民族性：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

连续性：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文化发展连续性的基础。

兼容性：每一种文化如同民族一样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有特殊性，又有共性的一面，就是不同文化之间在某些方面也有兼容性。

区域性：随着氏族宗法制的彻底崩解，区域文化的格局在宗族藩篱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这里既有一个民族内因地理差别形成不同的小区域文化，也有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形成的大区域文化，例如，中华文化。

2

所谓“突厥文化”，并非是“突厥人”发现的。正当突厥人早已忘记了自己的故乡和历史时，是欧洲的学者开拓了这个研究领域。在泛突厥主义出现之前，欧洲曾掀起两次以突厥文化为主题的活动。第一次是收集土耳其手工艺品和书画的热潮，突厥文化首次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第二次是所谓的“突厥学”活动，一批俄国、法国、匈牙利、丹麦、德国和英国的学者，开始对古突厥人、匈奴人和蒙古人进行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他们企图证明：突厥人是一个很古老的民族，历史上创造了高度的文明。这些活动不可能不对操突厥语诸民族中的知识分子产生深刻的影响，不可能不诱发这一部分人的新的民族主义思想——泛突厥主义。

突厥文化——泛突厥主义文化观的产生并非是偶然的，沙俄境内鞑靼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正是孕育这种文化的温床和土壤。

从政治上讲，19世纪沙俄统治中亚地区后，开始推行俄罗斯化等泛斯拉夫主义，激起了当地坚持自己宗教信仰和民族风俗习惯的少数民族的强烈抵制。鞑靼人受

沙俄统治年代最长，受俄罗斯化压力最甚，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反抗也最激烈。

从经济上讲，俄国征服中亚后，鞑靼的商业资本丧失了在中亚的垄断地位，面临俄罗斯资产阶级的步步紧逼，鞑靼工商资产阶级被迫组织力量与之抗衡。从 17 世纪以来，鞑靼人中已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活动积极、呐喊民族觉醒的以工商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产阶级。这个阶级正好成为泛突厥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

从宗教上讲，数百名鞑靼青年去中亚接受传统的伊斯兰教育，对泛突厥主义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被称之为泛突厥主义之父的鞑靼人伽思普林斯基曾提出一句最著名的泛突厥主义口号，即“在语言、思想、行动上联合起来！”这句口号，十分精炼地表明了泛突厥主义从文化入手，却又不仅仅局限于文化领域，它最终的目标是进入政治领域，谋求政权。

作为对泛斯拉夫主义反应的泛突厥主义，在初期确有保卫民族利益，抵御大俄罗斯主义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泛突厥主义外延的无限扩大，由民族主义发展为民族统一主义，最后又滑向民族扩张主义，终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所利用，成为一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反动思潮和政治运动，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生存构成威胁。

泛突厥主义问世后的 100 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每

逢世界大战，世界政治激烈震荡（如苏联解体、东欧易帜），泛突厥主义的活动就明显加强，因为只有这样的大规模战争与政治动荡，才能给它提供按照民族统一主义愿望，着手改变政治边界的机会。

两次世界大战中，泛突厥主义都几乎接近成功。但是，第一次尝试随着与土耳其结盟的德国被击败，德国关于改变土耳其东部边界，与俄国穆斯林联成一片的允诺也流产了。第二次尝试由于土耳其开始保持中立，到很晚才参加到胜利者一边，也无法取得泛突厥主义者想要获得的那种战争成果。

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等五国相继独立，虽然并非是泛突厥主义的胜利，但确实给泛突厥主义分子以新的兴奋点。刚刚从苏联中分立出来，还未充分尝到独立滋味的中亚国家，尽管在独立伊始，出于某种考虑，也曾念过泛突厥主义这本经，但从未真正奉行过泛突厥主义。他们既然不可能当上“突厥联盟”的盟主，又不愿放弃自身的独立，去当别国的政治附庸，那么合乎逻辑的发展道路必然就是摒弃泛突厥主义，寻求符合自己国情的民族主义的发展道路。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为什么泛突厥主义者至今还没有实现其政治目标，取得明显的政治效果呢？其原因：

第一，泛突厥主义运动除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段短暂历史外，始终没有能得到任何国家和政府的有力的一贯

的支持。历史表明，民族主义由于能产生强烈的民族感情和较深刻的对祖国的忠诚，因而比泛突厥主义更容易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和各个国家的青睐。即便是土耳其那样的具有泛突厥主义历史传统的国家，在泛突厥主义问题上也一直实行一种双重的标准：一方面以泛突厥主义“关心”、“声援”、“支持”所谓的“境外被压迫的突厥”；另一方面在国内却坚持以凯末尔主义而不是以泛突厥主义作为立国之本。泛突厥主义之所以从未在土耳其拥有凯末尔所倡导的民族主义那样巨大的吸引力，是因为它的超民族、超国家的极端学说一直与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相对立，不利于主权国家的统一，不利于人民的团结。

第二，泛突厥主义一直是小范围的所谓精英分子的运动，它只受到少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中产阶级的支持，规模很小，经常不过只有几百、最多也不过只有两三千人。由于它未能通过一项能被人民大众所理解、接受的纲领，以及完全忽视广大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社会经济问题，只致力于虚无缥缈的所谓“突厥民族”的解放，所以，它从未能发动他们所期望的那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从未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有力的支持。

第三，泛突厥主义运动缺少一个有权威的领导核心。各种团体林立，为一己利益争吵不休，形成不了一支统一的政治力量。同时，它又缺少一个完整而明确的指导思想去规范、统一各个团体的行动。组织上的松散无力和各

行其是，也是这个运动成效甚微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泛突厥主义运动的本质是极端的民族主义，或者称之为野心勃勃的民族主义，它是凌驾于一切国家、民族之上的民族统一主义。由于它是一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反动思潮，因此，既无深厚的群众基础，也难以得到各国政界领导人的支持。

泛突厥主义从 20 世纪初开始经历了鼎盛—蛰伏—复苏—衰落—重振—衰落这样三起三落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发展总趋势。泛突厥主义妄想重振旗鼓，重温旧梦的企图是不可能得逞的梦呓。但是作为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潮，它从来没有绝迹，从来没有停止活动，从来没有停止对新疆和其他操突厥语民族地区的渗透，时不时还会借尸还魂，或者以某种新的面貌出现，扰乱人心。仅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尽管泛突厥主义在政治上几起几落，没有取得明显的政治效果，但是在文化上或者说文化泛突厥主义却一直颇有影响，根深蒂固，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泛突厥主义是从“突厥文化”起始的。政治上的泛突厥主义往往容易引起主权国家的警觉，而文化上的泛突厥主义，经过西方学者的“包装”后，披着学术的光

环，以“突厥学”的面貌出现，往往容易突破政治壁垒，渗入一些国家内部，被操突厥语的一些民族中的知识分子所接受。

第二，泛突厥主义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宗教观深深扎根于所谓的突厥文化之中。政治上的泛突厥主义与文化上的泛突厥主义始终相伴随。每当政治上的泛突厥主义受到挫折后，就以文化泛突厥主义的形式蛰伏下来，一旦有合适的气候和土壤，文化上的泛突厥主义就会演化为政治上的泛突厥主义。可以这么讲，整个泛突厥主义的发展史就是政治泛突厥主义和文化泛突厥主义互相依存、互相交替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泛突厥主义是政治泛突厥主义的基础、母体、温床以及庇护所。既然有温床，有文化泛突厥主义长期存在，就不可能担保政治泛突厥主义不再卷土重来。这正是我们不能只重视政治泛突厥主义，而不重视文化泛突厥主义的原因，也正是我们开展对泛突厥主义文化观的批判和研究的重要原因。

第三，操突厥语诸民族所在的国家，几乎都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在历史上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受过帝国主义和殖民势力的欺压和蹂躏。他们渴望具有相同历史命运和共同宗教信仰的操突厥语诸民族能够联合起来，由弱变强，来抵御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势力的压迫。为此，他们急需创造一种共同的语言，塑造一种共同的思想，编

造一种共同的历史，来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以制造、杜撰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凌驾于操突厥语诸民族之上的超级民族——“突厥民族”，来满足某种民族狂妄自大的心理。泛突厥主义的文化观正好迎合了这种狭隘的民族心理，这就是泛突厥主义在文化上得以长期生存的重要原因。

第四，泛突厥主义者并不简单地排斥西方的东西，而是希望在保持突厥人和穆斯林本色的前提下完全地、毫无保留地进入西方文明。他们所强调的是：在完全进入西方文明之前，一定要首先发现、发掘自己的“突厥民族”文化，然后再全面系统地吸收欧洲文明。这种态度既容易获得操突厥语诸民族的认可，也博得西方国家的认同。

由于泛突厥主义运动的松散性，以及泛突厥主义骨干分子的各行其事，它在实际上并不存在统一的、严密的文化观，或者说并没有一种得到普遍认同的文化观，但是从泛突厥主义文化中派生出来的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和国家观却是十分明确的，渗透其中的文化观的荒谬性、欺骗性、煽动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开展对泛突厥主义文化观的批判和研究，在新疆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进入 20 世纪后，泛突厥主义传入新疆首先是在文化、教育领域，然后再进入政治领域。无论是 30 年代初南疆出现的两个短命的分裂政权，还是 40 年代艾力汗·吐烈炮制的所谓“独立宣

言”，无不有着泛突厥主义文化观的幽灵在作祟；无论是穆罕默德·伊敏杜撰的《东突厥斯坦史》，还是80年代出现的《匈奴简史》、《维吾尔人》、《维吾尔古代文学》等3本书，无不是泛突厥主义文化观的具体的集中体现。泛突厥主义文化观一方面鼓吹“建立在语言、宗教、民俗和政治废墟上”的所谓“突厥文化共同体”，千方百计要把新疆少数民族文化从多民族组成的主权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整体文化——中华民族文化中分离出来，为民族分裂主义张目；另一方面极力否认文化是一个开放的、不断更新的、具有发展活力的机体，否认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学习、加强文化交流和联系是客观存在的双向互利的过程，坚持封闭、守旧、僵化，反对改革、开放、转变，成为新疆和新疆各族人民走向现代化的障碍。

4

中国区域文化的格局可能形成在氏族宗法体制瓦解的春秋战国时期。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著的《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认为，当时的区域文化有：

1. 齐鲁文化，分布在今山东泰山以北(齐)以南(鲁)地区。春秋的齐鲁之地，已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齐鲁文化具备了正统性、伦理性等特征。一大批深刻影响中国文化进程的巨匠，如孔子、孟子、管子、墨子、孙武和邹衍等都诞生在这里。

2. 楚文化，大致分布在今两湖及河南、安徽、江西的部分地区。由于其文化渊源，可上溯到上古传说时代的祝融、三苗，所以，从文化形态学分析，它具有中原华夏文化和南部蛮夷文化杂交的鲜明特征。

3. 吴越文化，分布在今江苏、浙江、上海和安徽、江西的部分地区，具有东南沿海区域文化的特征。

4. 巴蜀文化，以四川为中心，包括陕南、鄂西及云贵的部分地区。

5. 秦文化，其分布范围以今陕西关中、汉中为中心，东起函谷关，西达陇中，南至秦岭，北抵贺兰山的广阔地带。与齐鲁文化不同的是，秦文化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的特点。秦人津津乐道的问题都是垦荒、耕作、攻伐、徭民等对国计民生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他们不屑于仁义礼乐的哲学论证，对人伦关系的道德要求也宽松得多。

6. 三晋文化，大致分布在今山西全境，河南的中、北部和河北的南部、中部，是中华文化的内核。法学思想构成了三晋文化的思想主体。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先生在论述以上六个区域文化时，论及了中原华夏文化与南部蛮夷文化的交融以及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无疑是十分可贵的。但是，我们认为仅仅归纳成为六个区域文化是不够的。以上区域文化虽然有少数民族文化的成分，但严格地说只是汉文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并非是近代才形成的，在中华

民族形成的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一直贯穿着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触、交流和融合。显而易见，在华夏文化区的周边存在着少数民族的文化区，如我们现在用西域文化、吐蕃文化、松辽文化、岭南文化等概念所表述的诸多少数民族文化，也就是说除了汉文化以外，还有诸如胡文化、蛮夷文化等这样的少数民族文化。中华文化就是由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组成的。其实，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汉文化中吸纳了许许多多少数民族的文化内涵，而少数民族的文化中也吸收了汉文化的内容，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胡服骑射”是见之于史书的最早记载。

公元前 302 年，赵武灵王为增强军事实力，以适应兼并战争的需要，毅然决定仿效北方游牧民族，改“博衣大带”的华夏服饰为上衣下袴的“胡服”，废除传统的车战，改学骑射，这就是著名的“胡服骑射”。这是一个对整个中华文化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这项改革的深远文化意义在于，它以开放的、发展的文化观为指导，不以大民族自居，从服装制式和作战方式的改革入手，极大地促进了中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华夏文化和胡（少数民族）文化、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华文化因而获得更加蓬勃旺盛的生机。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社会动荡的历史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古代民族先后脱离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

产方式，进入了与汉文化相适应的生存环境——湿润半湿润的大陆大河型生态环境，纷纷在内地建立政权。一方面这些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碰撞；另一方面由于几近一致的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又使这些民族与中原地区农业社会的“汉”文化发生了持续而激烈的碰撞。这是两种文化类型的碰撞，即农业社会文明与游牧社会文明的碰撞，先进生产方式与落后生产方式的碰撞。碰撞的结果导致了两种文明、两种文化的无法抗拒的双向渗透和融合。文化碰撞的对立面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从对方吸收对己有用的文化特质，潜移默化地改变原有文化的心理结构，在适应和调整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的一体化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文化，它既不是原有的汉文化，也不是原有的少数民族文化，这种一体化，体现为少数民族文化的“汉化”与汉文化的“胡化”。少数民族文化的“汉化”表现在：一是由少数民族统治者采用汉族封建统治的组织形式并推广儒学，以强力推进“汉化”进程；二是内迁的少数民族学习汉语，而且潜移默化地接受汉文化观念意识的熏陶和影响。汉文化的“胡化”则表现为粗旷、豪放、充满生气的北方少数民族精神，给温文尔雅、固守传统的汉文化带来了新鲜而活跃的因素。这种文化的整合，终于为盛唐的璀璨文化的形成，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唐文化之所以异彩焕发是因为不仅毫无顾忌地大量